

晚清旅美华人文学的美国形象和中国形象

向 忆 秋

(漳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 文章通过对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李恩富《我的中国童年》、黄遵宪《逐客篇》以及佚名作者《苦社会》进行文本细读,梳理了晚清旅美华人文学想象美国(他者)和中国(自我)的几种模式:容闳自传中的美国和中国分别被建构为文明和落后的形象;李恩富自传中的美国和中国则分别被描述为纯粹的“异”和诗意传统的中国形象;在《逐客篇》和《苦社会》中,美国和中国则主要被表述为一个背信弃约的种族主义国家或苦难的中国形象。晚清旅美华人对“他者”和“自我”的文学想象,奠定了后来旅美华人文学想象美国和中国的几种模式。

关键词: 旅美华人文学; 晚清; 美国形象; 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10(2010)-04-0057-05

清政府两度出使美国的大臣伍廷芳在其英文著作《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中曾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美国是最让中国人感兴趣的。”^[1]这是一个即便今天也确凿无疑的事实。继19世纪华人三次旅美高峰之后,20世纪旅美华人更是络绎不绝。有旅美华人就有“旅美华人文学”。“旅美华人文学”的创作主体“旅美华人”,包括“定居者”和“逗留者”,前者视美国为自己生命移植的安居地,后者指称那些因为劳务、留学、旅游、外交等目的短期滞留美国的华人。“旅美华人文学”超越文学文本的语种属性,开放地、动态地涵盖了自有旅美华人创作以来的汉语和非汉语文学。

晚清属于旅美华人文学发展的早期,也正是华人与美国相遇的早期阶段。这些最先与异文化相遇的旅美华人,他们文学中的“他者”形象(美国形象)如何呢?在与异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他们返身审视的“自我”形象(中国形象)又是如何呢?本文在细读晚清旅美华人(包括留学生、华工、外交官)代表性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梳理了晚清旅美华人文学所建构的三类美国形象和中国形象。

一 文明或落后:容闳自传中的美国形象和中国形象

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Yung Wing)是晚

清一位众所周知的特殊人物。他得欧美慈善资金支持,接受了17年完整的西方教育。1854年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之前身耶鲁学院,成为美国一流大学培养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后来得曾国藩和李鸿章支持,实现了他大学期间就“规画大略于胸中”的留学教育计划,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美国的历史。容闳在逝世前几年出版了英文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①为我们考察晚清旅美华人文学提供了珍贵文本。

容闳自传中的美国形象渗透着作者强烈的价值判断。美国在容闳笔下虽然具有它的“双面性”——在容闳描述中,作为个体形象的美国人,往往是一种慈善、博爱的高大形象;另一方面,容闳也并不伪饰美国的种族歧视。但总体而言,美国被容闳表述为一个文明的国家,他笔下捎带的种族歧视并没有影响容闳对文明美国的倾心认同。

美国人格格高尚、宅心仁慈,热心教育和公益事业,有一种宗教式的博爱精神,这是容闳笔下美国人的基本形象。容闳描述马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校长布朗先生“和蔼可亲,温然有礼”,助教威廉麦克“德行纯懿,思想卓犖”。容闳在新世界第一次遇良友巴夫人,赞其

收稿日期:2009-12-13

作者简介:向忆秋,(1974—),女,土家族,湖南溆浦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霍尔特出版社,1909年。后来“容闳自传”多次出版,最早的中译本当是恽铁樵、徐凤石翻译,191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学东渐记》。本论文使用的是中英文合刊的《容闳自传 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品格高尚,有足令人敬爱。其宗教之信仰尤诚笃,本其慈善之怀,常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孟松学校(Manson Academy)的海门校长“总其言行,无可訾议,不愧为新英格兰师表。”美国人的慈善博爱,对容闳而言,具体体现在对容闳的教育资助上。作为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教育时间最长久的华人之一,容闳 17 年的教育经费,全得自于英美人的帮助。容闳回忆 1847 年随布朗校长赴美留学时说:“予等留美期内,不独经费有着,即父母等亦至少得两年之赡养。既惠我身,又及家族,仁人君子之用心,可谓至矣。”可以说,容闳本身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产物”。容闳一生的功德声望,全得自于欧美特别是美国人士在教育上的慈善资助。容闳毫无保留地赞誉美国人,反复强调美国人“宅心仁慈”不是没有依据的。容闳所建构的心术仁慈、博爱、热心公益和教育的美国人形象,后来成为许多旅美华人屡屡“复制”的“套话”。虽然容闳并没有伪饰美国,令人可敬地指出了“美人种族之见日深,仇视华人之心亦日盛”,并作为留学生副监督和清政府首任驻美公使(副使)向美国政府抗议,但“容闳自传”捎带的指责和抗议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他对美国的总体认同。容闳身受 17 年“文明之教育”,大学期间就立志“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此后容闳一生都念念不忘“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容闳的这些表白,正是说明了他认定西方文明是拯救中国的良方。由此,容闳在旅美华人文学中较早建构了一类“正”话语美国形象。

和容闳建构的美国形象恰成对比的是他笔下的中国形象。容闳自传绝大部分篇幅是回忆自己学成归国后报效祖国的人生历程。容闳一生热心报国,最后却一事无成,落得逃亡和葬身美国的悲怆命运,原因何在?最大的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和顽固。容闳屡屡谈及满洲政府的政治腐败:“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满洲政府“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对于中国人的顽固和守旧,容闳也深有感触。他说中国的革命“固数见不鲜”,但“类不过一姓之废兴”,“以故中国两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正是中国人顽固成性、裹足不前,致使列强“喧宾夺主”、侵略中国主权,而令国人处于“受人侮辱之结果”。容闳赞光绪帝“洵伟人也”,但即使帝王革新图强也终究敌不过顽固势力的破坏。可以说,腐败和顽固成为容闳笔下中国形象最为鲜明的特征。其次,容闳描述了一个暴虐而专制的中国形象,中国官吏之暴虐令容闳发指。容闳回忆某年“粤乱”,他亲赴法场探视,只见尸横遍野,“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以予所知,其中

强半,皆无辜冤死。”在容闳的感觉里,这是一个无视人权(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幸福权)的落后国家。容闳所致力的留学事业的失败,重大原因之一就是“终日饱吸自由空气”的幼童,已经“不复安行矩步”,这在“久处专制压力之下”而“绝无自由之精神”的中国官场看来,留美幼童“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封建专制社会是容不得自由思想的。总的来说,容闳笔下行行政腐败、思想专制、统治暴虐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老大帝国。

一个是文明的美国,一个是落后的中国,容闳所建构的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代表了晚清旅美华人对美国和中国的一类认识。

二 “异”或传统中国:

李恩富笔下的美国形象和中国形象

李恩富(Lee Yan Phou)是容闳监督的赴美幼童中一位富有文学禀赋的留学生。随着清政府撤销留学事务所,已经入读耶鲁大学的李恩富在 1881 年被召回国,后来他秘密地重返美国。1887 年李恩富成为又一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华人学生,同年出版英文自传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我的中国童年》),^①这应该是第一部有影响力的旅美华人著作。

美国在李恩富“自传”中是一种“异”、一个“他者”形象。

德国学者顾彬(Wolfgang Kubin)说,“异”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表示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与‘异’相对的乃是自己。”¹²可以说,“异”就是与“自我”不同的事、物、人,在“自我”文化眼光的观照下,“异”实际上也即是“他者”(Other)。在《我的中国童年》中,我们看到李恩富处处以“自我”和“他者”的关系看待中美文化之“异”。关于日历,李恩富说,我们“不像你们那样”使用英国历法按阳历作标准;谈到生活,李恩富说“我们东方人的喜好和需求非常简单,无须去设计像儿童车这样的奢侈品。我们用‘背带’来代替。”谈及游戏娱乐,李恩富说中国男孩“和垒球、足球、曲棍球、骑自行车、溜冰、滑水或网球等无缘。他也对消耗自己体力的事不感兴趣。”“在中国,由于不许年轻女子和男士参加彼此的社团,跳舞当然也就更不可能了……至于在跳华尔兹时,把手搂住女孩子的腰,中国的男士是不会允许自己做这种不雅的事的。”谈教育,李恩富介绍说,中国普及私塾教育,“那时还不懂得什么‘义务教育’”,“在中国,不存在‘学校校董会’之类的组织”。从李恩富中美文化对比的行文方式,我们感到其时的美国是一种真正的现代生活和现代文化。现代中国

^①波士顿的洛思罗普(Lothrop)出版社邀请李恩富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1887 年《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即在该社出版。本文引用的版本为珠海出版社,2006 年 9 月版。

人“当然”地生活于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里,再也感觉不到“相异性”的冲击,但在李恩富年代,它完全是作为一种“异”而深深震动了中国人灵魂。可以说,“异”的刺激来源于人们与一种不同于“自我”的文明、观念等的接触和感知。从《我的中国童年》中,我们知道“异”的刺激自李恩富幼年就产生了。李恩富家乡广东香山是中国最早与西方人相遇的地方之一,因此当地人很早就感知到异文化的冲击。李恩富的姑父在上海一家美国茶叶货仓当买办,因此出洋前李恩富便与美国文明有了直接接触。面对“红头发、穿紧身衣”的那些“特殊人群”,李恩富深感惊奇,外国人的衣服是一个谜。外国女人和男子“手挽手地走”,她们尖利刺耳的声音,对李恩富的礼仪观又是一个冲击。对留美幼童而言,西方文化是令人非常尴尬又惊异的“他者”文明。李恩富描述第二批留美幼童如期抵达马萨诸塞州后,李恩富的临时监护人“伸出双手拥抱我,亲我。……我十分窘迫,无言以对。这是自我襁褓时期以来未曾有过的第一个亲吻。”莎拉·威尔太太的慈爱举动在李恩富感觉里极为“异”于中国人内敛的情感表现。李恩富孙子理查德·威尔·李博士评介李恩富和“威尔祖母”家族关系时说,“在威尔的家中,他过着一种和在广东中山完全不同的亲密而温馨的家庭生活。”^[3]“完全不同”说明了李恩富及其子孙后裔对“异”的理性感知,对“自我”和“他者”的清醒认识。

李恩富自传《我的中国童年》从家庭生活、饮食烹饪、游戏娱乐、家中女孩、私塾教育、宗教活动、传统节日、说书趣闻等方面叙述了自己的中国童年。李恩富笔下的中国让人感觉到是一个纯然的传统中国。学术界通常认为,传统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带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 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4]我们从李恩富的“自传”分明看到了作者对中国“大传统”和“小传统”富有文学趣味的书写。在“家庭生活”、“私塾教育”等章节,李恩富凸现了儒家传统文化对个人生命和生活的“规矩”。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等级观念,它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从属关系。李恩富就说,“在中国,每个人都处在他人的严格管制中。”“对于中国的孩子,要求他懂得服从人和尊重人,往往多于要求他懂得同情人、关爱人。”因此,小辈不能失礼地直呼长辈的名字,小辈即使受了责备也“绝不能反驳,绝不能申辩。”在私塾教育方面,私塾的老师严

格要求学童,孩子们被要求学习、背诵的都是儒家典籍——“四书”和“五经”是必读的。“所有的学习都要大声地念,念得越响,嗓门越尖,越能赢得好学生的称誉。”“大传统”就是如此通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在李恩富的童年延续着。在关于“游戏娱乐”、“说书趣闻”、“饮食烹饪”、“传统节日”等章节,李恩富饶有兴致地将“小传统”的中国民俗和日常生活的一面呈现在英语读者面前。斗蛐蛐(蟋蟀)、放风筝、猜钱币、拜神祭祀、春节的焰火、元宵的龙灯、民歌……李恩富笔下的传统中国有着浪漫和诗意的一面。和他笔下他者形象不曾掺杂作者主观的价值判断一样,^①李恩富笔下的自我形象也不加随意的价值判断。稍有不同的是,李恩富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即对于传统中国的描述,好似带上了一层缅怀的感情,在西方读者面前,李恩富并没有自惭形秽的意思。

可以说,李恩富所建构的不附加价值判断的“异”族形象和传统诗意的中国形象,代表了晚清旅美华人对他者和自我认识的又一种类型。

三 种族主义美国或苦难中国

——《逐客篇》和《苦社会》中的美国形象和中国形象

黄遵宪在1882—1885年出任旧金山第二任总领事,其《逐客篇》^②是晚清一首重要的旅美华人诗歌。最早发表于1905年、上海图书集成局铜活字排版的小说《苦社会》,则是晚清旅美华工的代表文学。^③虽然创作主体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悬殊,但他们所建构的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却是颇为一致。

《逐客篇》和《苦社会》中的美国形象主要被表述为一个背信弃义的种族主义国家。

黄遵宪因为美国“籍约设例”,而作《逐客篇》“感而赋此”。身为旅美的外交官,黄遵宪对华人“竟作异类虐”极为悲愤。华人移民虽然对美国有着“蓝缕启山林,邱墟变城郭”的伟大功绩,但美国仍旧偏见地诬蔑华人移民“生性极齷齪”、“野蛮性嗜杀”。作者不禁愤慨地说:“但是黄面人,无罪亦筹掠。”在白人种族主义者将黄种人“妖魔化”话语中,华人被视为“黄祸”,华人出现在美国国土上就成了一种“罪恶”。因此,针对华人的苛例和驱逐自19世纪中期就开始蔓延。黄遵宪谴责美国背信弃约、蛮横霸道,“慨想华盛顿,颇具霸王略,檄告美利坚,广土在西漠。九夷及八蛮,一任通邛笮。黄白红黑种,一律等土著。逮今不百年,食言会不作。”由此,黄遵宪的《逐

①即便对于初抵三藩市(San Francisco)所见到的“高耸、坚固、优美”的城市建筑,以及煤气、自来水、电铃、升降机等这些“现代设施”,李恩富也只是说它“最能激发一个人的好奇心,推进对事物的观察”。即便李恩富描述留美幼童头一次坐上火车自旧金山横穿美国大陆东行时遭遇路劫,以致妇女尖叫、孩子号哭、幼童们“毛发直立”的恐怖场景,李恩富也只是说:“美国文明的一面就这样牢牢地刻在我的心上。”

②被收入《入境庐诗草》。又见于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版,2—4页。
③1905年7月申报馆发行。后收入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11月上海第二次印刷,15—113页。书前的漱石生“叙”论说《苦社会》:“夫是书作于旅美华工,以旅美之人,叙旅美之事,……自二十回以后,几于有字皆泪,有泪皆血,……是诚人人不忍卒读之书,而又人人不可不读之书也。书既成,航海递华。”这是它为旅美华工所作的重要证据。

客篇》建构了一个忘恩负义、背信弃约的种族主义国家。^① 佚名作者的小说《苦社会》同样建构了一个背信弃约的种族主义国家。从小说所述情况推测,李心纯等人旅美经商时间当在 1887—1903 年间,这恰处于美国严酷的排华时期。^② 所以,鲁吉园与心纯在船上重逢,就劝告他做生意不必非到美国,因为“他们在种族的界限,极是分明”,但心纯很是疑惑。“但是美国向来自称是自由祖国,怎么好夺别人的自由?”“只是美国那里,我们有公使,有领事,比不得秘鲁。有事时,还有处申诉,美国人怎能抹杀两国原定的条约,只用强权呢?”自 37 回以后,《苦社会》将美国“排华法”所定苛例,一一套在人物故事中,使得《苦社会》后部分几乎成了美国“排华法”的小说演绎版本。比如华工注册的苛例,就将大部分“不合例”华工驱逐出境。又有巡捕到处查“凭纸”,若不小心遗失仍旧遭递解出境的命运。心纯厂里的郭阿双就是个例子。比如“赛会苛例”:美国按照通例邀请中国组织人赴博览会,又独独将中国人当囚犯防备,要身有凭据的“合例可信”之人,要“遵从量数”的本人照片,入境要 500 元保单,要直往会场且派差监守,会后搭“最先开行的轮船回国”。最令心纯、伯符和子丰怒发冲冠的是“木屋监禁”和“机器量身”。在 1910 年天使岛移民拘禁营启用前,“木屋监禁”就被施诸华人移民。在指定口岸入境的华人,可疑者一律拨入“木屋候审”。大商家汪紫兰的妻子因为街名说错一字被拘“木屋”而致疯。即使领事备文向关上要人,回文也是“照例拘禁,听候查审”。《苦社会》中所谓“机器量身”之机器,乃是欧美各国监狱通用的“巴太连量身机器”,实际上也即“罪囚法量身”,将华人当罪犯待。以至于伯符看了报上新定这些苛例,拍案叫道:“心纯,我们这里真住不得了!”心纯和子丰看了也都怒气上冲,说:“我们中国人给美国糟蹋的够了,还有这许多的条款!”美国苛例愈出愈奇、愈奇愈酷,那些凭空的霹雳、无风的狂澜,叫人防不胜防,整日生活在精神惊恐中。《苦社会》叙述中国外交官谭随员在领事馆门口被美国巡捕殴打、拘捕,因为受辱上吊而死的故事,不是凭空杜撰的。遍及华工、华商、留学生、中国官员,凡是在美国的华人,没有人

能够指望不受歧视和骚扰。1862 年一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两院报告书》就指出,“整个社会体制对本州华人所加的罪行和迫害,将使世界上最不开化的民族堕入莫及。”^③ 20 年后美国联邦政府制定“排华法”,将对华人的歧视上升到国家法律的高度,美国整个国家体制对华人的迫害可想而知。由此,《苦社会》建构了一个背信弃义、种族歧视深重的美国形象。

应该说,叙写华人地狱生活,谴责美国背信弃义,从而在旅美华人文学史上建构一种“反话语”美国形象,是《逐客篇》、《苦社会》及其同时期一批“反美华工禁约文学”普遍的文学姿态和文学内容。^④

黄遵宪的《逐客篇》和佚名作者《苦社会》中的中国形象,可以概括为苦难中国。这个苦难的中国形象在《苦社会》中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建构:其一是中国内地社会积弱而积贫、民不聊生,其二在中外关系中,中国和华人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苦社会》共 48 回。小说前 10 回写到宦官后裔、苏州人阮通甫一家生存维艰,在蒙学堂做穷教习的李心纯一家也是债台高筑、卖古画度年关,两家互相扶持、穷极思变;第 11 回到 22 回转向历来被认为中国“粮仓”的江南苏州一带官匪横行、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叙述藤筑卿、庄明卿这些薄有家产者的破落,两人相商出洋谋生。这前 22 回写第一层“苦”即中国内地民不聊生之“苦”。自 23 回到 29 回,尽叙华工在船上旅程惨无人道的遭遇:藤筑卿、庄明卿与鲁吉园重逢一同去洋,以鲁吉园带头、船上华工们侠肝义胆集资救助被工头和洋人殴打致重伤的阮通甫,但阮通甫全家仍旧惨遭横死。船至秘鲁的航程,“从阮通甫以后,陆续死了一百五十多人”,都是赤条条丢下大海喂了鱼族。将登岸时候,又有七八十具堆叠一起恶臭熏天的腐烂肢体。连事先鼻子擦了药水的洋人也“呕吐不住”。水手用铁铲铲了连婆丢下海去,人人“都觉头昏目眩,胸口隐隐有些痛”。第 30 回到 32 回,写华工抵达秘鲁,备受镣铐加身、铁索锁颈的罪囚之苦。又叙及小吕宋华人数万被屠杀、喋血大仑山的故事。这 23 回到 32 回写出了旅外华人的地狱之路。《苦社会》之“苦”,真乃一层“苦”于一层。第

①《逐客篇》主要描摹了一个背信弃约、蛮横霸道的种族主义国家,但它也寥寥几笔谈及美国“地皮足一路,有金尽跳跃”的“金山形象”。这实际上是黄遵宪“复制”了中国传说中美国黄金遍地的金山形象。例如鸦片战争时期张维屏有一篇《金山篇》说米利坚(今译美利坚)人“近来得布大欢喜,以金易布群争先。其山不知几千里,其金不知几万千。彼氓蚩蚩弃地,有客采采金满船。宝诚可贵地不爱,利果可图人共传。”这种对美国黄金遍地的想象图景流传下来,成为后来旅美华人想象美国的“套话”。

②按照陈素贞《亚裔美国人诠释史》一书的分期,1849—1882 年是自由移民时期;1882—1943 年是排华时期;1943—1965 年是特别立法的有效移民时期;1965 年迄今为重新移民时期。

③王维城的《新乐府两章》、莫等闲斋主人的《国之仇八章》以及广东方言创作的长篇诗歌《抵制美国》(佚名),这些诗歌中的美国形象较之《苦社会》更加凶残无比。“轮船到埠心惶惶,关员查检如虎狼。支节四体寸寸量,医生验疫都遭殃。……验毕闲置木屋内,鞭笞呼叱若犬羊。警察监守肩荷枪,一言不合命随殇。朋友不能顾,亲族不敢望。”(《新乐府两章》)“排华时期”美国对到埠华人查检、量体、验疫、木屋拘押,既侵犯了华人身自由,更是对华人精神的摧残,不能不令华人普天同愤。所以《国之仇八章》将美国对华人的摧残视为“国仇”。“国之仇!国之仇!豺虎之牙,巨狼之爪,不扑杀我华人不肯休。”在此美国被想象为扑杀华人的“虎狼形象”。佚名的长篇方言诗歌《抵制美国》层层深入,叙述美国“初开金山招聘我地华人至”,等到铁路筑成、开山成埠,美国就背信弃约地驱逐华人。“做也你全无理就相欺你禁约我地华工唔合道理……□□约各国皆知任由来往心无二”。诗歌强烈谴责美国忘恩负义,正所谓“恩将仇报你委错了人皮”;叙述美国千般欺凌华人就“好比埋中拿蛤任渠煎皮”,华人屋宇被烧、老幼被杀,“走得东离西散好似到舍澎湖”;进而呼吁国人“要生条良策制治渠的蛮虎”,“大众□□□办货不买渠花旗”,目的在于要使“番奴闻得渠就胆心惊”,在暗中抵制达到“渠改番条约胜过旧时”。可以说,将美国“他者”想象成背信弃约、忘恩负义和专横强权的“蛮虎”、“番奴”形象,对美国形象的这一建构,后来随着岁月积累而成为一种对异国(美国)形象的集体阐释,从而深深影响了后来“天使岛文学”的美国想象。

34回以后全力叙写旅美华人备受美国歧视和驱逐之“苦”。该部分叙述做了华阿大船上账房的鲁吉园,在船只开往美国旧金山途中再遇李心纯。此时的李心纯因为曾经在上海经商而小有资本,准备进一步到旧金山设厂发财。34回以后,就以李心纯、王伯符、顾子丰三位华商在唐人街的日常生活,一步一步加深对美国“禁约”的了解、认识,揭露美国种族歧视、排斥华人族裔的罪恶。小说最后被驱逐的留学生赵铁君有一席话:“我辈华人,到处都做人的鱼肉,美人刀劲俎坚,尤出寻常。政府的权力不足恃,公使的唇舌不足动。”这正道出了华人处境的悲惨和中国政府在美国强权下的软弱无力。从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来看,《苦社会》委实是建构了一个苦难的中国形象。诗人黄遵宪更是在他的《逐客篇》起首就感叹:“呜呼民何辜,值此国运剥。轩项五千年,到今国极弱。”正是因为中国积弱而积贫,才使得美国人敢于公然背信弃约驱逐华人,以致“皇华与大汉,第供异族讟。”中国人备受美国糟蹋和歧视,哪怕“倒倾四海水”,也是“此耻难洗濯”。

参考文献:

- [1] 伍廷芳. 前言 [M] // 一个东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国.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 1.
- [2] 顾彬 (Wolfgang Kubin). 关于“异”的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1
- [3] 李恩富. 导言 [M] // 我的中国童年.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 4
- [4] 黄万华. 传统在海外: 中华文化传统和海外华人文学 [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 67.
- [5] 陈依范. 美国华人 [M].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5 169
- [6] [法]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形象 [M] //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55

(责任编辑: 李 莉)

The American Image and the Chinese Image in the Chinese-American literatur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ANG Yiqiu

(Department of Chinese, Zhangzhou Normal College,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several imaginary models of America and China in the Chinese-American literatur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by reading Yung Wing's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Lee Yanphou's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 and *The Miserable Society* by an anonymous author. Firstly, America and China in Yung Wing's autobiography are pictured respectively as a civilized nation and a backward one. Secondly, America and China in Lee Yanphou's autobiography are portrayed as an alien nation and a poetic one respectively. Thirdly, America and China in *On Driving Away Visitors* and *The Miserable Society* are described as a perfidious country of racialism and a country in distress separately.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 and "oneself" on the part of Chinese residents in Americ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s established several models of America and China in the Chinese-American literature of later eras.

Key words: Chinese-American literatur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America image; the Chinese image